



□ 王西广

在我成长的年代里，糖是特别诱人的。家里有个玻璃瓶子，大概能盛一斤糖，到了冬天瓶子里多少总会有点红糖。瓶子里的红糖主要是用来帮助我吃药的，平时我与其无缘。生病了，该吃药了，药很苦，在嗓子里打转儿咽不下去，这时母亲便用小汤匙舀上一匙糖，填进我嘴里，说：“赶快咽！”或者一开始便将药放进糖里，把药和糖一块儿往嘴里送。糖的甜味儿冲淡了药的苦味儿，使口腔和舌上甜丝丝的，减轻了吃药的痛苦。至于糖块，只能偶尔买上几分钱的解解馋。这是偷着做的事。那时，没有胶囊这类药，多数药片药丸药面儿是苦的，小孩儿难以下咽，吃药时常常又哭又闹，甚至闭着嘴拒绝吃，不少家长都是以糖为诱饵哄孩子吃下的。这种办法虽不能完全奏效，但多半会成功。如若强制灌药，常常效果不佳，灌进去的没有洒掉的多，药被糟蹋不少。至于以红糖蒸糖饼糖包，那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才可享受的，平常

无望。

村里有两个卖小玩意儿的，他们的担子或小推车里都少不了糖块。自制的晶亮的琥珀色四方形糖块，花花绿绿的粘着糖粒的糖块糖球，没有任何包装，却非常吸引人，能让人驻足不前，眼睛放光。每到正月里，他们的生意便兴旺起来。尤其是村委大院里一搭起戏台子，从大年初一到初五，白天有戏，晚上有戏，台上演戏、台下看戏，满院子挤着黑压压的人，院子门口或人群之外的摊子前人气随之旺了起来，有围着说话拉呱看热闹的，有掏钱买东西的。这时候，孩子手里有了拜年挣来的几毛钱，会将其大半换成糖块解馋。手里没有钱的则会缠着大人，哭着闹着要吃糖。总之，一年之中只有这几天孩子们才能解解馋，过把吃糖瘾。至今，摊子前马灯昏暗，灯光照亮的蚕豆、糖块、糖豆、糖稀，包东西的褐色纸，甚至琥珀色糖块的甜味儿还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我一个远房姥爷赶集摆摊儿，卖点皮筋、泥人、糖块，以及针头线脑，常来俺村赶集。那时我四五岁，还未上小学。有一次，我和侄子纪成在集上逛着玩，来到他的摊子前，双脚像被人施了魔法似的定在了那里。我们太馋糖了，那盛着花花绿绿糖块的盒子就摆在地上，磁铁似的吸住了我们的眼

睛。这位远房姥爷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，不认得我们，也没留意我们停在他的摊子前；他更想不到，我们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孩子，竟会干出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来。看着看着，花花绿绿的糖块迷住了我们的眼睛，它们仿佛变成了一群穿戴鲜艳的小精灵，朝我们笑着，召唤我们快快动手。我们商量也没商量，一句话没说，纪成伸出了手，我也伸出了手，一人抓了几块糖，然后撒腿跑开了。这不是偷，是明抢！我们十分紧张，手里抓着几块糖，拼命地沿着一条胡同朝东坑沿儿上跑去，连头也不敢回。跑着跑着，我们身后的惊呼声渐渐弱了，听不清了。到了东坑沿儿上，我们停下来，回头看看，摆摊儿的老头并没有追来，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不少。我们走到坑沿空地的蓖麻棵下，坐在地上吃起了胜利果实。当别人告诉他，抢糖的两个孩子是谁家的，估计这个姥爷只能一笑了之了。到后来，我才知道我们抢的是姥爷李心童的糖。这事在家里常被父母笑着提起，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“抢劫”。

在朱庄读高小时，我与周义德来回做伴儿。义德头脑聪明、追求时尚，有了钱就买点喜爱的东西。小铁盒香脂油、带拉链的小钱包、方便易带的小刀小镜子，这些玩意儿他都

有。他的小钱包里时常有几毛钱，有毛票，也有硬币。有天下午放了学，回家时我们顺道去了供销社门市部。那天门市部里卖一种黢黑的糖块，一毛钱二十块，非常便宜。他打开小钱包，掏出一毛钱，买了二十块。当售货员把糖块用纸包起来递给他，装了鼓鼓一包，我们喜出望外，眉开眼笑。虽然糖块颜色不美，但是甜得很，很解馋。黑乎乎的糖块是什么糖做的，至今我也不清楚。夜幕降临，路影模糊，天上蹦出了一颗颗星星。一路上俺俩吃得心花怒放，嘴唇黑乎乎的，毫不在意。因为物美价廉，后来他又买过一次。再买，门市部里没有了。兜里有了糖块，一路上边走边吃，叫人非常开心，义德乐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。有一次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糖做的，这么黑、这么甜。他回答，管它是什么做的，只要甜就行！

回首往事，光阴已逾半个多世纪，如今糖已经不缺乏，糖块花样也多得不可计数，而我人到老年遍尝了酸甜苦辣种种滋味，对于糖再没有小时候那种特别的喜欢，感情淡漠得很。孙女孙子也喜欢吃糖，但馋糖的程度已无法与我童年时相比。现在的家长限制孩子们吃糖，不是怕多花钱，而是担心糖吃多了影响孩子身体健康，发育不良。

远隔重洋的牵挂



□ 赵亚男

我的手机壳里，放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闲暇时，我时常拿出来看一看。照片拍摄于1978年，地点是临清红光照相馆。那一年，父亲作为带队医生，即将赴坦桑尼亚开展为期三年的医疗援助。出发前，我们一家六口来到照相馆，留下了这张合影。今年，父亲去世了。再看照片，他仍是当年的模样，那段与远行、牵挂有关的岁月，也重新浮现在我眼前。

照片第一排从左到右，是父亲、弟弟、母亲和妹妹；第二排左边是哥哥，右边是我。我在兄妹四人中排行第二。我们穿着朴素的衣服，靠在一起，望着镜头。那时的我们大概不会想到，48年后，这张合影会成为如此珍贵的念想。

从临清到坦桑尼亚，父亲远赴非洲，一去就是三年。援非期间，他为当地医疗工作作出许多贡献，还曾受邀到坦桑尼亚总统和总理家中做客。作

为女儿，想到父亲的工作能够得到这样的认可，我感到十分骄傲。

父亲在国外承担医疗援助任务，母亲则在家带着我们四个孩子，撑起日常生活。三年时间并不算长，却让我们成长了很多。父亲不在身边，哥哥和我也帮着照顾弟弟妹妹。作为姐姐，我渐渐懂得，除了被照顾，也要学着照顾别人，帮母亲做一些事情。那些年，母亲白天上班，晚上在灯下缝补衣裳，一针一线，像是把日子密密实地缝在一起。

如今回想，父亲援非的三年，也是母亲一个人扛过来的三年。带着四个孩子生活，操持家务，还要上班，其中的辛苦，在这张照片里看不出来。镜头留下了母亲的面容，却没有留下她每天要承担的琐碎。等我自己成了母亲，才真切体会到她当年的不容易。

这张照片已经泛黄，边角破损，几道折痕穿过画面。今年父亲离开后，我的目光总会在他脸上多停留一会儿。有些关于父亲的事，过去总觉得来日方长，可以慢慢问；如今他不在了，只能从记忆里慢慢寻找。有时看着照片，仿佛还能听见照相馆里快门按下前，父亲低声说“都坐好了”的声音。

前些日子，女儿问起我这张老照



作者(后排右一)的全家福

片背后的故事。我指着照片，一一讲给她听：外公当年如何远赴非洲，外婆如何在家守着四个孩子，我们几个又怎样相互照应着长大。这张照片记录的，不只是六个人的面容，还有父亲援

非的经历、母亲持家的辛劳，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陪伴。临清红光照相馆留下的这一瞬间，保存着我们一家人的相聚，也保存着48年始末未曾淡去的牵挂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